



汉|风|周|刊

08

徐州日报

2026年10月1日 星期四

责编:燕原斌 美编:张昊 校对:戚妍娜

投稿邮箱:1740449948@qq.com

总第190期

统筹:张瑾

探求中华文化起源 保护民族传统基因

关注前沿学术研究 分享人文思想光芒



■作者简介

管仁福,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教授,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院长。出版《苏轼徐州诗文辑注》(主编);《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苏轼徐州诗文名篇赏析》(主编之一)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一代大文豪苏轼作为徐州知州,在徐州生活了近两年时间。

他率民抗洪、兴建黄楼、劝农耕桑、寻找煤炭、弘文重教,展示了一州之长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时,他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还有弥足珍贵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在气功、烹饪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徐州这座古城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就可见的苏轼文化遗存而言,黄楼、云龙山、放鹤亭、燕子楼、快哉亭等人文景观承载着诸多苏轼动人的故事,他留下的300多篇诗文作品,更是人们了解他这一时期政治作为、生活状况、情感经历、思想轨迹的第一手文本资料。

依据苏轼在徐州的政治实践与诗文作品,探析苏轼徐州时期的思想文化遗产,其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探析苏轼徐州时期的文化精神

管仁福

编者按

949年前,北宋文豪苏轼知徐州,固城郭、惠民生,留下了勤政为民的千古政绩、温润厚重的人文风骨。秦观一句“惟愿一识苏徐州”,让“苏徐州”成为千年IP。

徐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苏轼文化发展列为全市重点文化工作。对此,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院长管仁福教授依据苏轼的政治实践与诗文作品,梳理并探析其徐州时期的思想文化遗产,为当代人文软实力建设和城市文化品位提升提供借鉴。

“以民为本，遗爱于民”的黄楼意蕴

“以民为本,遗爱于民”,是苏轼徐州时期文化精神最为核心的内容,最为突出耀眼。苏轼给徐州人民留下的大爱就是带领徐州军民抗洪,使古城和人民免遭洪水侵袭,抗洪之后还留下了一座仁爱永恒的黄楼。

苏轼建黄楼有扬名后世之意,准确地讲就是“遗爱”后世,正如苏轼在《黄楼致语口号》一诗中所写的那样:“谁凭阑干赏风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遗爱”一词是古代赞美官员勤政为民、遗留仁爱于后世的一个崇高的赞美词。苏轼到徐州写的第一首诗是《徐州送交代仲达少卿》:

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
旧尹未嫌衰废久,清樽犹许再三开。
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
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
诗的最后两联表达了对前任的赞美和祝愿之情。“满城遗爱知谁继”中的“遗爱”一词很值得体会,这是此诗的一个关键词,也是贯穿他一生知八州的一个坚定信念。

“遗爱”一词在先秦时期的《国语》《左传》等历史文献中就已出现,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贤相,著名的政治家,他去世后孔子非常悲痛,并用“古之遗爱”给予评价。

陶渊明在他的《影答形》诗中也用到这个词:“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立善”就要积极有为,立德、立功、立言,其最终指向不仅是个体生命扬名于后世,更为重要的是遗留仁爱于身后,让后人念念不忘,这才是真正的生命永恒。

苏轼在徐州创作的诗文中,有两处用到“遗爱”一词,除了《徐州送交代仲达少卿》,还有一篇文章《眉州远景楼记》,用“遗爱”一词祝愿他的家乡守官。苏轼在徐州时期表现出的以“以民为本,遗爱于民”为内核的精神,还包含勤政爱民、进取意识、不惧个人安危的责任担当等方面的内容。

“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一脉相传的优秀政治文化思想,“遗爱于民”是对这一思想执着践行的结果,两者体现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品格,也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的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相一致。这是值得我们大力提倡和弘扬的文化精神。

自由适意的放鹤情怀

政事之余,苏轼常与云龙山隐士张天骥交往。一次在云龙山放鹤亭聚会之后,他写下著名的《放鹤亭记》,其中对“清远闲放”的飞鹤和张天骥自由适意生活表达了向往的放鹤情怀。苏轼作为朝廷官员不可能放



黄楼。

本报记者 秦媛 摄
插图依托 AI 技术绘制

兼容并包的文化智慧

下政务去过隐居生活,他便以鹤和酒为例,说明身份不同利害随之两样。

对苏轼来说,清远闲放只能向往,不可能真正去践行。这也体现了他辩证思维、边界意识的哲学智慧。

可以说,苏轼在徐州时期形成的“黄楼意蕴”和“放鹤情怀”内在是相通的。黄楼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加油站,放鹤亭是让我们暂停一下,欣赏人生美妙风景的精神驿站。

黄楼意蕴激励我们积极有为,造福社会,遗爱后人;放鹤情怀倡导我们积极无为,欣赏生活,完善自我。黄楼意蕴张扬群体意识,放鹤情怀追求个体自由。黄楼意蕴与放鹤情怀和谐共生,内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大智慧,也是构成健全人格的两个基本要素。

苏轼在徐州时期所形成的黄楼意蕴与放鹤情怀,是留给徐州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寓意于物”的审美趣味

先秦时期,大思想家荀子曾言:“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分界,荀子认为君子具有主体的道德精神,可以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役使。

苏轼在徐州时期写了一篇《宝绘堂记》,讲的是生活审美的旨趣,其内在精神和荀子讲的君子和小人的人格分界是相通的。

《宝绘堂记》是苏轼应好友王诜之邀而写的一篇记体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意思是欣赏事物应保持一种审美的心态、审美的边界,超然物外,而不能过分沉溺其中。

深一层讲,“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无物不足以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有病,虽无物不足以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

苏轼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诫好友王诜收藏书画要保持平常心和审美的态度,避免像自己年少时那样因过度喜爱而颠倒轻重。

苏轼在密州时写过一篇《超然台记》,与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和《放鹤亭记》这三篇记体文,写作时间相近,旨趣相似,都在思考人生如何超越外在事物的羁绊,实现人生的真正快乐。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在苏轼的眼里,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都可使人快乐,不必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

“超然物外”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主旨,表达的是对世间外物主观超越的哲学智慧。“超然物外”是一种审美理想。

其实,现实中的人是很难“超然物外”的。“寓意于物”既根植于“超然物外”,又立足于现实生活,是一种主观超越而又立足现实生活的审美智慧。对现实的事物抱有一种“寓意于物”的态度,而不是“留意于物”,才能保持心灵的宁静与快乐。

以平常之心“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就会内心宁静而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后来遭遇“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不久就从困境中走出来,以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开始了新的人生,其中原因,离不开他在密州、徐州时期形成的“超然物外”“寓意于物”的哲学智慧和审美趣味的思想奠基。

《放鹤亭记》是反映苏轼徐州时期思想精神的一篇重要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文章写到苏轼与张天骥等朋友在云龙山放鹤亭上饮酒而乐,引出各有所乐的议论。作者以鹤和酒为媒介,正反论证了人的快乐有别,边界不同,歌颂了隐者的快乐。

隐者摆脱世俗功名利禄的羁绊,他们的生活就像那两只“甚驯而善飞”之鹤,“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逍遥自在,令人神往。

苏轼《放鹤亭记》中虽然透露“清远闲放”的仙风道气,但引证用典都是儒家经典,如《周易》《诗经》《左传》等,这也是一篇文章以明道之文。

后来,苏轼在黄州写下《前赤壁赋》,清风明月、历史人生、宇宙万物都融汇在“顺其自然”“逝水如斯”和万物无尽藏的哲学世界中。

在苏轼的思想里,儒、释、道三家思想不是对立排斥的,而是互通的、兼容的,在人文关怀方面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的人生智慧就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兼容并包是苏轼思想的大智慧,是根植于文化品格“厚德载物”的大智慧。

情深义重的伦理关怀

苏轼知徐州期间,在为政、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他在交游方面相当活跃,体现了交游广泛、情深义重的伦理关怀。

苏轼和弟弟苏辙亦师亦友,情意弥笃。苏轼到徐州任职,苏辙陪同来徐,兄弟同吃同住100多天,这是兄弟俩自苏轼离京到地方为官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次。兄弟俩在一起开心,离别伤心。

后人曾评价:“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轼在徐州时期,与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巩、文同等人皆有诗文往来,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的核心成员。与高士高僧张天骥、道潜(参寥)的交往,也体现了苏轼情深义重的伦理关怀。

苏轼在徐州写过一篇奏议《乞医疗病囚状》,请求朝廷为狱中病囚给予人道医疗,认为这是“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的“善政”;苏轼还写过一篇《徐州祭枯骨文》,他看到野外“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之建坟墓,把枯骨安放在内。

在苏轼心里,人人平等,交往中没有等级偏见。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

■结语

苏轼徐州时期的文化精神,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也是一种人生美学,无论古今,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林语堂先生曾说:“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

苏轼率领徐州人民抗洪胜利后所建的黄楼,已成为他遗爱徐州千载的文化地标;其为国为民、敢于舍身的精神,也为后世州官提供了为政的参照。

“不好人。”苏轼这些言行已超出平常的人伦关怀,而映现出一种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

徐州时期的苏轼,无论是为政还是个人情感,都增添了人生历练的沧桑和成熟,诗文的思想精神更具有包容性。

从文学的创作而言,好的文章是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在生活中勤于思考,善于发现,才能写出有独特体悟的文章。苏轼徐州时期的诗文真正做到了文与道俱、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守正创新的创作原则

苏轼知徐州期间为政业绩显著,特别是不顾身家性命与徐州人民誓死抗洪保城,可谓惊天动地。后人评价苏轼这一时期的作为多着眼于他的政治才干与业绩。但苏轼作为一代大文豪,在他政务繁忙之余,还创作了大量诗文,时人陈师仲曾将苏轼这一时期诗文编为《黄楼集》,遗憾没有流传下来。

2014年,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编著了《苏轼徐州诗文辑注》一书,全书共辑出苏轼徐州时期诗文330篇,其中诗193首、词21篇、文116篇(含3篇残篇)。这虽不是苏轼在徐州时期的全部作品,但可以说绝大部分作品已辑录其中。这是目前为止苏轼徐州诗文作品最全的一部辑注本。

从《苏轼徐州诗文辑注》一书可以看出,与苏轼这一时期为政和交游密切相关的作品居多,而且都言之有物,情感真切,既反映了苏轼这一时期生活和为政的方方面面,也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的诗或直面现实或唱和应答。诗歌的平易化和议论化是其突出的特色。《石炭并引》诗第一次把开采煤炭的题材写到诗里,揭开了煤炭文学的第一页。诗歌名篇还有《九日黄楼作》《登云龙山》《百步洪二首并叙》《送参寥师》《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等。

他的词进一步打破“词为艳科”的藩篱,第一次用词的形式反映田园风光。代表名篇有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浣溪沙》,《遇逸乐》(明月如霜)和《江城子·别徐州》等也堪称经典之作。

他的散文或陈辞治国为政方略,或抒发对历史人生的哲理感悟,或委婉讽喻现实,内容多元、形式多样、文笔斐然。被收入《古文观止》的《放鹤亭记》是苏轼这一时期的千古不朽名作。放鹤亭由此闻名遐迩,云龙山也成为人们争相登临游览的名胜之地。散文代表名篇还有《徐州上皇帝书》《宝绘堂记》《眉州远景楼记》《游桓山记》《日喻》等。

苏轼徐州时期的文学创作不拘旧套,完全是为情造文、“随物赋形”,喜怒哀乐皆寓于笔端。他为文议论风发,多用典故,艺术手法多有创新,特别是诗词创作方面,题材多有拓展。例如他的《浣溪沙》五首把农村题材写到词里,这是对词体形式内容的一次突破和解放。

苏轼文化已积淀为徐州厚重而珍贵的城市文化基因。

在徐州历史名人文化中,它是一种颇具文化力、生命力、感染力、感召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的精神文化、铸魂文化、生命文化。它既取材于史实,又以苏轼文学作品为载体,人文内涵丰富多彩,对后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品格的影响更为强大、深入而久远,也将对徐州人文软实力建设和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起到更积极、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苏轼像。

本报记者 刘冰 摄